

秦汉之际的“功”、“德”思想 与汉陵陪葬墓的兴起

马永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 “功” “德”思想 帝陵 陪葬墓 分封制

摘要: 秦汉之际, 社会上出现了没有世袭贵族身份的平民也可以因有“功”、“德”而称王的思想, 这种思想为刘邦建立汉王朝,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提供了法理依据。刘邦建汉以后, 为了稳固其统治, 推行分封诸侯的政策, 以示“与天下同利”之“德”。为了进一步彰显其“德”, 他又将分封制扩大到了依照帝国格局规划建造的帝陵布局中, 将这个微缩的帝国以陪葬墓园的形式分封给诸侯、功臣, 这当为汉陵陪葬墓兴起的主要原因。

KEY WORDS ‘Merit’ ‘Virtue’ Imperial mausoleum Accompanying tombs Feudal system

ABSTRACT: Betwee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re appeared a new idea that a person without aristocratic background could claim kingship based on his ‘merit’ and ‘virtue’. This idea provides the basis for legitimizing the Han Dynasty and Liu Bang, who was a common person by origin. After founding the Han Dynasty, Liu Bang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appointing local kings to show his ‘virtue’ of ‘sharing interests with the entire world.’ To further display his ‘virtue’, he expanded this policy to the plan of imperial mausoleums, by parceling out lands to his kings and meritorious officials in the form of allowing their tombs to accompany their mausoleums, which was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rise of the institution of accompanying tombs of Han Dynasty mausoleums.

公元前 202 年, 刘邦建立了汉王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帝国。刘邦之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份立国登极, 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功”、“德”思想是分不开的。汉王朝建立后, 为了稳固刘氏江山, 刘邦以分封诸侯彰显其“德”, 并将之延用到帝陵规划和建设中, 从而导致了帝陵陪葬墓的兴起。

一、秦汉之际的“功”、“德”思想

“功”、“德”思想其实早在秦扫灭六合、一统天下时即兆其端。秦始皇之所以要尊称为“皇帝”, 就是“自以为德兼三皇, 功过五帝”^[1], 其称尊号的依据不再是高贵出身, 而是功德无量。秦末战乱, 陈胜首义, 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的口号, 对世袭制度提出质疑。在其占领陈之后, 当地豪杰父老劝说陈胜称王, 其理由就是“将军身被坚执锐, 率士卒以诛暴秦, 复立楚社稷, 存亡继绝, 功德宜为王。”^[3]这是第一次明确

提出平民也可以因有“功德”而称王。嗣后, 陈胜部将武臣王赵、韩广王燕均是平民因功德而王思想的深化和扩大。“这种王权不起源于世袭而起源于功德的理念, 正是平民王政的法理根据。”^[4]这种法理根据为此后刘邦登极称帝,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这种平民王政却是昙花一现, 随着陈胜被杀和其张楚政权的瓦解, 时人又对这种“平民王政”提出了质疑。范增在总结陈胜的经验教训时认为: “今陈胜首事, 不立楚后而自立, 其势不长。”^[5]认为其失败的原因是实行“平民王政”。齐国王族田儋杀秦狄令自立为齐王后, 召集豪吏子弟曰: “诸侯皆反秦自立, 齐, 古之建国, 儋, 田氏, 当王。”^[6]虽然田儋也有军功, 但其却只强调自己王族后裔的身份。陈胜部将周市率军攻下魏地后, 拒绝被拥立为王, 其理由是“今天下共畔秦, 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7]遂迎立魏公子咎为魏王。为王的依据再次回归为王室后裔, 可见时人意识中还有很强的贵族世袭意识。随着时人

思想观念的反复,旧王族纷纷被立为王。陈胜死后,其部将秦嘉立楚国旧贵族景氏后裔景驹为楚王,张耳等立赵国旧王族赵歇为赵王。后来,项梁又立楚国王室之后心为楚怀王,故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此情此景,对当时身为义军将领的刘邦来说,应当记忆深刻。

平民王政再次兴起是在秦王朝彻底覆灭,项羽重新分封天下之后。此前,项羽与诸将曰:“天下初发难,假立诸侯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8]另据《史记》卷七记载:项羽分封后,“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9]项羽还在封地上做文章,“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群臣诸将善地。”^[10]可见项羽虽然也分封了旧王族,但其封王的根据是倾向于按军功而论。项羽的分封依据和做法为平民王政再次打开了一扇门。

二、刘邦的“功”、“德”

史书记载,刘邦出生在楚国的一户平民家庭,其父母均为农民,并无显赫身世。直至陈胜首义,刘邦都寂寂无闻地做着他的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刘邦响应,率众攻占沛县,开始参与反秦斗争,并建功立业。陈胜败亡后,作为反秦义军的一支主要力量,刘邦与在河北作战的项羽遥相呼应,依怀王之约一路向西,破武关,克关中,占咸阳,降子婴,为推翻秦王朝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后又与项羽鏖战四年,最终迫使其乌江自刎而全取天下。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汜水之阳被大臣拥戴称帝,其法理依据就是“功盛德厚”。其部属在劝进的疏文中说:“先时秦为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刘邦虚言推辞,诸侯王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11]

“功”自然是刘邦灭秦翦楚之功,此乃人所

共见。但“德”是一个虚化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此人认为是“德”,彼人或许会认为“非德”,要将其具体表现出来并为大家认同,必须要有积“德”的具体措施,这个措施在当时就是实行分封制,“与天下同利”^[12],刘邦也确实这样做了:

汉二年,“汉王东略地,……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13]

汉四年,“立张耳为赵王。”^[14]

汉四年,“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15]汉五年,徙为楚王。

汉四年,立英布为淮南王。

汉五年,“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16]

汉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17]

汉五年,“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王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18]

汉五年,立卢绾为燕王。

汉六年,“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19]“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20]“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21]

正因如此,在上述疏文中部属们褒颂刘邦有“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之德,更有“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22]、“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之德。尤其是后者,被视为刘邦的大德。有学者指出:“秦帝之‘私天下’就属于‘公德’不纯,而刘邦兼容分封而‘帝天下’则被视为‘公德’甚高。”^[23]《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一次庆贺胜利的酒宴上,刘邦要求大臣直言其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24]总而言之,一句话,刘邦能“与天下同利”,这既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德之所在。

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认为:“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25]可见,当时的人们即认为分封诸侯是高祖最大之“德”。

李开元指出:“刘邦之所以即皇帝位之理由,在于其功最高,德最厚。其功,即用武力之所成,也就是军功。其德,即封赏之实行,也就是恩德。此功与德,不但是刘邦皇权之起源的理念,也是其起源的历史。”^[26]

三、帝陵是帝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

我们知道,古人的灵魂观念非常严重,认为人死后灵魂还会像生前一样在“阴间”继续生活,因此,需要仿照生前的生活用度为其陪葬,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27]荀子认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28]《左传·昭公七年》载:郑国大夫子产在回答晋国赵景子“伯有犹能为鬼乎”的问题时说:“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认为死者拥有的“用物”越多则魂魄越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人们不遗余力地厚葬死者,不但为其埋入种类多数量大的各类陪葬品,还仿照其生前所居来建造墓葬。据《吕氏春秋·安死》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陵墓肯定也会模仿其宫室、都城,甚至整个王朝帝国进行规划设计。有学者研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诸侯王墓模仿生前宫殿的特征较为明显,进一步而言,帝陵模仿生前所居的宫殿、都城,或整个帝国都存在可能。”^[29]《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树草木以象山。”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在其陵墓中不仅设置有“宫观百官”,放置有“奇器珍怪”,甚至连“百川江河大海”亦有之,乃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考古发现也证实秦始皇帝陵设置有便殿、丽山食官等寺园吏舍,有代表军队的三个兵马俑坑,代表宫廷苑囿、园囿的上焦村马厰坑、珍禽异兽坑和鱼池,以及象征太仆、廷尉、左弋外池等机构的铜车马坑、K0006 陪葬坑、K0007 陪葬坑等。^[30]袁仲一认为:秦始皇帝陵园“把生前的

一切都模拟于地下,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再现。”^[31]段清波进一步指出:秦始皇帝陵“陵园城垣象征帝国的都城”,“地宫中以水银模拟帝国的疆域版图”,“秦始皇帝陵园是皇帝理念下的产物,其设计理念体现了秦始皇个人对皇权之下中央集权体制充满自信的思想,其设计思想最重要之处是超越皇帝个人生活之上的帝国理念的再现。”^[32]汉承秦制,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虽然帝陵规模较秦始皇陵大为缩小,但其设计理念应当一脉相承。赵化成即提出“西汉帝陵继承了秦始皇陵布局结构象征宫城、宫域的设计思想。”^[33]刘庆柱、李毓芳也认为:“西汉帝陵陵园系模仿都城长安而筑。”^[34]焦南峰更明确指出:“西汉帝陵则在部分继承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抽象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实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西汉王朝是汉阳陵的建设摹本,汉阳陵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建设而成的。”^[35]

四、陪葬墓是另一种形式的分封制

显而易见,西汉帝陵是汉帝国的在另一个世界的延伸,为了强化汉高祖刘邦的“德至渥”,西汉统治者应该也会将分封制延伸到这个世界。其实汉室对高祖以一介平民之身,因“功德”而帝天下是否服众,一直都心存忧虑。高祖在结束楚汉战争的第二年,即迫不及待地以“谋反”为借口翦除异姓诸侯王就是其直接表现。直至高祖十二年,刘邦对汉室社稷仍然忧心忡忡,在其行将去世的前夕,下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6]诏书中以拳拳之心着重强调其分封诸侯的做法足以对得起原本与其平起平坐的众大臣,告诫他们不要再有非分之想,如果出现背叛者,希望他们能起而保卫汉室“共伐诛之”。高祖逝后,吕后甚至因恐

惧而萌发了诛灭功臣的想法,其理由便是“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耿耿,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37]甚至在惠帝死后,吕后还因担心陈平等大臣不服“哭而泣不下。”^[38]高后二年,下诏强调:“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39]在这种为了稳固汉室江山再三强调高祖之“德”的氛围下,帝陵作为帝国的延伸,让汉室以陪葬墓的方式再行分封,无疑又一次彰显了高祖之“德”。

虽然有史书提及“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40]但文献明确记载葬“毕”(周文王与武王的陵区)的仅有被封鲁公的周公旦一人^[41],而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其陪葬王陵区的主要原因应是其王室的血缘关系,而非诸侯或功臣的身份,它体现的是《周礼》所描述的那种“聚族而葬”的葬制。之前的商代王陵区也未见确认的异姓大臣陪葬墓。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实行的是君王亲信、侍从和姬妾的殉葬。直至春秋时期,还有殉葬之俗,《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死后葬于雍(今陕西凤翔县),“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始皇陵区虽然发现了一些陪葬墓,但这些墓葬的主人主要为秦始皇的嫔妃或宗室公子王孙^[42],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尚有“公墓制”的子遗^[43],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臣陪葬墓。而“西汉帝陵的陪葬墓数量多,规模大。皇帝为陪葬者在帝陵区专辟茔地,墓上筑有高大封土,冢旁或建有礼制建筑,这些不同于前代殉葬或陪葬者。”^[44]

我们注意到,西汉早中期帝陵大多将陪葬墓区规划在陵区东北部,而西汉王朝分封的大多数王国、侯国都在汉长安城以东地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上述提到,西汉帝陵是模仿帝国设计建造的,那么,陪葬墓区的位置安排当是对应现实中的诸侯封邑。

根据史料记载,长陵陪葬者除戚夫人以及景、武时期的外戚田氏家族之外,大都是当初跟随高祖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汉立国后均被封王封侯,如萧何、曹参、张良、周勃、王陵、张耳、纪信等。

萧何在刘邦统一全国的战争和西汉初期的

政治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刘邦誉为第一功臣,封酈侯。曹参作为刘邦的一员猛将,南征北战,攻城略地,“身被七十创”,“功最多”^[45],被封为平阳侯。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46],是刘邦的主要谋士,被封留侯。王陵、周勃均因战功卓著被分别封为安国侯、绛侯。张耳是刘邦在汉四年分封的赵王,当年即去世。纪信因早死,未及封侯,但其曾在汉三年项羽大军围困荥阳时,佯扮刘邦吸引楚军,使刘邦乘机逃脱,纪信因此而被项羽俘获杀害。如此功绩,如其健在当有资格封侯。张耳和纪信在刘邦葬长陵时已去世多年,汉室将其迁葬(或为衣冠冢)至长陵陪葬墓区,更说明此举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另外,考古资料显示,西汉帝陵的陪葬墓区有着较为严整的整体规划,每座墓葬也有自己的界域。汉景帝阳陵是目前考古工作最为全面的一座西汉帝陵,其东区陪葬墓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原边。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帝陵东侧“神道”横贯陪葬墓区,考古勘探在“神道”南北两侧发现了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围沟完整、南北对称、排列有序的陪葬墓园群。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中部均有1~2座甲字形或梯形主墓,封土多为圆丘形,周围或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坑和小墓。墓园内或有建筑遗址。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目前已发现东西向壕沟22条,南北向的壕沟百余条。及其由上述壕沟分隔而成的陪葬墓园16排107座。其中司马道南侧10排92座,北侧6排15座。加上尚未钻探区域,估计会有墓园200多座。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47]。

史籍中也有相关记载,可以与之印证。《汉书·李广传》记载:武帝时,丞相乐安侯李蔡“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哀帝时,宠幸董贤,“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罍鼎甚盛。”^[48]可见陪葬墓园也像封国或封邑一样是有地域限制的,并以壕沟或墙垣为界。实际上唐太宗在《九嶷山卜陵诏》中提及西汉帝陵陪葬墓时,曾云“若莹魂有

识,还如畴曩。居址相望,不亦善乎!”^[49]直接将陪葬墓园称为“居址”,王、侯的“居址”自然是其封邑。焦南峰针对汉景帝阳陵的陪葬墓研究认为:“诸侯王的墓园至少代表其诸侯王国的都城,甚或象征其所管辖的整个诸侯王国。同理,列侯的墓园象征的是诸侯国;公主和郡太守的墓园是其所属或管理的邑和郡的地下微缩。也就是说这一个个陪葬墓园就是西汉王朝的一个个王国、侯国、邑、郡在汉阳陵中的具体体现。”^[50]

总而言之,汉室依照帝国格局设计、建设帝陵,为了突出高祖和汉室之“德”,稳固其统治,便将分封制沿用到帝陵规划中,以陪葬墓园的形式将这个微缩的帝国分封给诸侯、功臣,这应当是汉初帝陵陪葬墓兴起的主要原因。此后,西汉帝陵沿袭长陵规划布局,陪葬墓成为帝陵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承蒙焦南峰先生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 [1] 司马光.资治通鉴:秦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80.
 [5]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司马迁.史记:田儼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司马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班固.汉书:陈胜项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同[5]
 [10] 班固.汉书:高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同[10].
 [12]同[10].
 [13]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同[13].
 [15]同[13].
 [16]同[13].
 [17]同[11].
 [18]同[11].
 [19]同[13].
 [20]同[11].
 [21] 班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同[13].

- [23]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49.
 [24]同[11].
 [25] 班固.汉书:贾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 同[4]:139.
 [27] 洪亮吉.左传:哀公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8] 王天海.荀子校释:礼论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9] 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J].中原文物,2010(5).
 [30] a.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b.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2003(11). c.焦南峰.左弋外池(秦始皇帝陵7号坑性质蠡测)[J].文物,2005(12).
 [31]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396.
 [32]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4-237.
 [33]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J].文物,2006(9).
 [34]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1985(5).
 [35] 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J].考古,2007(11).
 [36] 同[10].
 [37] 同[10].
 [38] 班固.汉书:外戚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9] 班固.汉书:高后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6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1]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2] 同[32]:1-16.
 [43]同[33].
 [44]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下篇第7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5] 班固.汉书:萧何曹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6]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前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48] 班固.汉书:董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9] 同[40](第76卷).
 [50]同[35].

(责任编辑 谭青枝)